

第 1 章 革 命

千年之交的财务呈报是一种精妙绝伦的新旧杂合。复式账簿会计虽然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但它却仍然是财务报表结构的主体框架。20 世纪初期，会计理论逐步演变成如何最好地计量资产、负债、权益和盈余以及将会计计量与经济概念相比较的受托理论。

过去 35 年间，受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和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管制的财务呈报要求，无论是在数量方面还是在复杂性方面都发展得很快^①。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AICPA, 1994) 和投资管理与研究协会 (AIMR, 1993)^② 已经对现行制度是否适应 21 世纪财务呈报的挑战进行了评价，并且提出了对该制度要做的许多重大变革的建议。许多有关要求揭示非财务数据、前瞻性数据和公允价值数据的提案都可以看成是信息方法在财务呈报中运用的自然拓展。就其本身涵义而言，信息方法在看待、评价和规范财务呈报的方式上具有意想不到的影响。这种根本性的变革也就是财务呈报的革命，同时也是本

^①SEC 是根据 1933 年和 1934 年证券法而成立的独立联邦政府机构。它被授权确保股份公司的“充分与公允 (full and fair)”披露。斯克逊 (Skousen, 1983) 称其活动性质是极为优秀的。FASB 是制定用于向股东编制年度报告的财务会计准则的民间组织。FASB 的财务会计准则公报也因此而被称之为 FAS，并按顺序编号。创造性术语财务呈报 (Financial Reporting) 被用于泛指财务报表和财务披露。

^②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AICPA) 是主要由公共会计职业成员组成的职业团体。投资管理与研究协会 (AIMR) 是主要由财务分析师组成的职业团体。

书的主题。

本章作为引言将简要透视财务呈报的目的，尤其突出财务报表的目标。然后介绍信息方法和从信息观角度来讨论权责发生制会计的作用。接着描述财务呈报环境的主要利益关系人和经济后果。为了完成这个框架，需要单独讨论财务呈报的几种趋势。财务呈报环境的主要特征就是它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它对财务呈报利益关系人偏好的影响。

管理当局或财务呈报规范者对财务呈报制度的选择是一种实质性选择。这种选择涉及到对不同利益关系人的影响做出一种权衡。某一具体的财务呈报要求是一种政治（或社会选择）程序的结果。

本章将为理解财务呈报的革命提供一个基础，并且将在结束部分概述后续章节的主要内容。

1.1

历史观

管理当局的受托职能是主导财务报表目的的早期观点。在这一观点下，管理当局是资本提供者（换言之，即股东和信贷者）授权控制其部分财务资源的受托人。在这个意义上，财务报表就是提供给资本提供者易于评价管理当局受托关系的报告。各种各样的呈报制度都有可能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但在财务会计领域，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仅仅报告现金流量是不够的，而某种形式的应计会计才是适当的。

对应计会计优越性的基本肯定源自佩顿和利特尔顿（1940）的专著，它主要讨论了配比概念。这本专著被称为是对 20 世纪财务会计贡献最大的专著之一^①。配比概念指的是：收入和费用之所以应当被记录，是因为努力与成就的恰当配合。报告现金收入和现金支出不会有恰当的配比，而应计会计的某种形式则可以做到这一点。应计会计对恰当的财务呈报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应计程序是模糊的和没有很好定义的。例如，在历史成本会计框架下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如存货计价的后进先出法和先进先出法，折旧的直线法和加速折旧法，这就使影响一家企业财务报表的每一主要事项存在许多成本与收入配比的备选方法。除历史成本会计外，各种形式的现行成本和市场价值会计又进一步增添了许多备选的方法。因此，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何为应计方

^①美国会计学会对外财务报告概念与准则委员会（1977）。

法的“最佳”。这一问题在本质上可以看成是规范的问题。

评价备选应计方法的途径之一是试图从总的定义中去推导出如净收益等的具体标准。净收益可以定义为收入与费用之间的差额（加减利得或损失）。从同义反复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但却不能表达它的内在本质。如果试图从探索收入与费用的各种定义来寻求更深的理解，就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费用一般可定义为已经耗费的成本，但这一定义对于如何确定耗费的基础却显得无言以对。如折旧概念，折旧被描述为原始成本按预计使用年限的分配，这在同义反复的角度看也是正确的，但它却不能提供在面对众多可能的分配方法时，究竟应以何种标准去进行选择的内在本质。

另一种途径是要问，“究竟何种属性是‘理想的’净收益所应当具有的属性？于是，会计备选又会面对以这些‘想要的’标准去进行评价。当一种‘想要的’属性方法被选中，财务会计理论家们通常便采用经济收益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下，会计选择是用他们认为接近于这种“理想”境地的方法来评价的。它假定经济收益是一个完整定义的概念，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处于确定的状态，或将不确定性按一种随意的态度予以处置。在跨期间的背景下，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通常作为企业或其证券的计价模型被采用。经济收益被定义为在适当调整投入（如追加的普通股发行）或提款（如股利）后所得到的现金流量现值的变化。

正如在第 3 章所要讨论的，在完善和完全市场条件下，这一概念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例如，它不仅反映了管理当局在本年度经营活动的结果（如当期现金流量），而且还反映了把影响纳入本年度计量的净收益。所以，从受托责任观来看，经济净收益具有引人注目的质量。

这种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佩顿（Paton, 1922）、坎宁（Canning, 1929）和亚历山大（Alexander, 1950）。它一直都被用来比较具体的会计选择，如折旧方法、租赁会计和长期应收应付款的处理。这种方法也促进了财务呈报中市场价值或现行成本方法的提出。其主要代表有爱德华兹和贝尔（Edwards and Bell, 1961）、钱伯斯（Chambers, 1966）和斯特林（Sterling, 1970）。

1.2

信息观

从经济收益计量观向“信息”观的转移发生在 60 年代后期。这主要表现为信息经济学、证券价格和行为科学在财务会计研究中的运用。FASB 的财务

会计概念公告第 1 号(1978)反映了这种变化。它指出：

财务呈报应当提供现在的、潜在的投资人和信贷人以及其他用户用以评价预期现金流入的数量、时间和不确定性的有用信息……由于投资者和信贷人的现金流量与企业的现金流量有关，所以，财务呈报应当提供有助于投资人、信贷人和其他人士评价与相关企业预期现金净流入的数量、时间和不确定性的信息。(p. viii)

财务报表数据应该提供未来现金流量评价的有用信息这一观念在表面上看似似乎并无特别，但如果仔细推敲，信息观已经在几个方面引起了财务报表编制和解释的显著变化^①。第 2 章将探讨信息方法及其含义。

导致这种转移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1) 当与企业相关的资产和要求权处于不完善和不完全市场下的时候，经济收益的概念是无法很好定义的。例如，在确定性的简单情形中，企业的价值是用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表达的。现值模式把跨期现金流量有效地转换为一个被称之为现值的单一数字。在完善和完全市场条件下，单一数字便足以恰当地表达现金流量，但如果没有完善和完全市场假设，诸如此类转换运算的属性就会被混淆。正如在不完善和不完全市场条件下财务报表中所报告的许多资产和要求权一样，经济收益的概念是不能恰当界定的。所以，财务报表数据与其所试图反映的‘理想’之间，在概念上并不清楚。(2) 退一步讲，即使有要求权的相关市场存在（例如可上市权益证券），也很难就‘最佳’呈报方法达成共识。尤其是采用经济收益方法而不是证据来制定财务会计准则时更是如此。由于各种集团或利益关系人，如股东、信贷人、财务分析师、规范者（如 FASB 和 SEC）、管理当局、审计师等都会受到财务呈报要求中选择的影响，所以，他们在所要求的选择中都会拥有利益。这些利益并不能完全纳入经济收益方法的框架内。在任何情况下，经济收益观都难以就财务标准应当是什么达成一种共识，而且，它还不能说明缺乏共识的理由。

财务呈报数据发挥着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信息作用：一个作用是使得决策制定者，如投资者，在各种备选方案如可选投资组合中选出最佳行动方案更为容易；另一个作用是使缔约方如管理当局和投资人之间的缔约更为容易，因为该合约中支付条款可部分地以财务呈报数据来定义。以企业会计净收益为基础而界定的管理当局激励合约便是一例。这两个作用都有助于理解管理当局和财务呈报规范者为什么会把会计选择视为一个实质性问题的原因。这种见解也有助于理解准则制定为什么是一个政治程序的结果。有关这

^①Armstrong (1977) 报告了与应用信息观完全相反的观点。受托责任通常被作为优先选择而加以引用。但是，根据 FASB (1976b)，受托责任观是置于信息观下的一种观点。

方面的细节将在第 2 章中加以描述。

1.3

信息观下的应计会计

尽管信息观潜在地代表了财务报表目的方面的巨大转变,但 FASB 却认为以净收益数字披露为主的应计会计仍然优于与这一“新”目的——关于未来现金流量的信息保持一致的现金流量会计。FASB(1978)指出:

以应计会计为基础的有关企业盈余的信息通常在表现企业当前和持续产生现金流量的能力方面优于仅限于现金收入和付出方面的财务信息。(p.ix)

财务呈报的主要目的是关于盈余及其构成的信息。(p.ix 附加强调)

尽管 FASB 有此见解,但应计会计的功用却仍然让人生疑。证券分析中的一个发展趋势是盈余导向的计价方法正在向现金流量的折现方法转移。现行财务呈报规则中的低效率被列为其中的首要原因。伊尻雄士(Ijiri, 1978)表达了对应计会计重要性的见解。他提出财务报表应当以现金流量导向为基础,并提出了几点理由:(1)在过去的现金流量和未来的现金流量之间存在某种直接的逻辑联系(换言之,它们具有类似的性质和特点)。(2)现金流量提供了更具原始色彩的制度。根据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原理(该原理距今已差不多有 700 年历史),在证明更复杂的方法增加了什么东西以前,应当使用更简单的方法。(3)现金流量由于并不具有与通常被称之为经济收益的盈余概念相同的内涵,所以,它的误导性也较低。

挑战应计程序开始使财务会计和财务报表现行结构的核心部位受到攻击。FASB 选择再次强调应计会计的重要性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应计会计代表转移或累计现金流量的一种方式,如图 1—1 所示。它所反映的是除现金收入和付出之外的信息。例如,有关应收款项账龄的信息可以通过预计坏账准备的方式来反映。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下的存货,可以反映存货变现能力的信息。在更一般意义上,应计反映了管理当局对未来现金流量的期望和以一个比过去和现在现金流量更具潜在综合性的信息系统为基础。应计可以说涉及到某种对未来更为准确和更为精确的预测,而且,应计会计还可以传递不包括现金收入和付出在内的信息。正如 FASB 所提议的,应计会计可以把现金流量转换为比当前现金流量更具有表现力的未来现金流量和股利支付能力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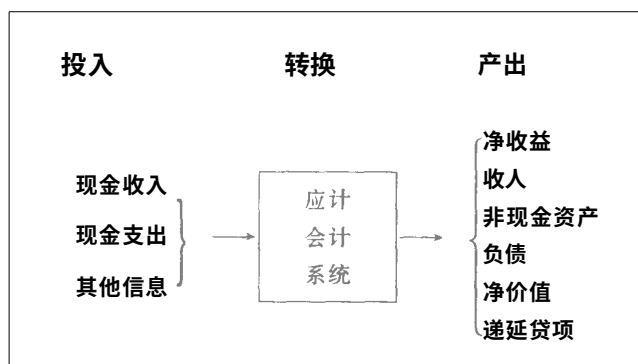


图 1—1 应计会计程序

然而，应计会计的功用是一个没有结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将源数据应用于公开范围？一个问题是处理这些数据的比较成本。在某种程度上，投资者对数据项目的处理也许还可以采用某种相对统一的方式（如加总），但如果由公司来执行这种处理，而不是由分析师或投资者来多次重复这种处理，也许更具有成本效率。当然，关于加总的方法也许并无共识可言，但任何加总大多都会导致信息的丢失。所以，当以累计数据呈报时，用户在试图找回这些损失信息的过程中也许会发生成本。因而，处理成本与累计水平之间也许并不完全是一种简单的相关关系。更进一步讲，除成本问题外，由于累计数据的缘故，还可能存在其他的非披露性影响。所以，恰当的累计水平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平衡问题，收益确定可以看成是一个特别的情形。在这个层面上，应计会计可以看成是在一个只呈报现金流量与一个较充分揭示的更流光溢彩的制度之间的一种潜在的成本与效率调和。有关这一问题的内容将在后续章节中作更详尽的讨论。

1.4

财务呈报环境

如果把向信息观的转移放在现行财务呈报环境中，也许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理解。这一环境是由各种各样受 FASB 和 SEC 财务呈报要求影响或在其中拥有立场的集团或个人组成的。这些集团包括投资人、信息中介、规范者、管

理当局和审计师以及其他人士。^①

作为财务呈报环境中最典型的特征，投资程序涉及到对证券当前消费的放弃，即是对未来、不确定现金流量的要求权。对不确定的未来现金流量的要求权代表了未来消费指令所体现的价值。投资者必须决定如何在当前消费和投资之间分配财富，以及如何在各种可提供的证券当中安排投资所需的资金数额。投资者在客观上便需要有助于评价与证券和与提供这些证券的企业相关联的未来现金流量的信息。

然而，投资者的行动并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处在一个较大的投资环境中。这一环境包括几个特征（1）投资者，部分也许受财务和会计训练的局限，有机会利用财务中介（如投资公司）的服务，可以转让一部分投资程序给他们。

（2）投资者，部分也许受取得和解释财务信息能力的局限，有机会利用信息中介（如分析师）的服务，可以转让部分或者全部信息采集和处理功能给他们。

（1）投资者有机会投资许多证券，从而使与单一证券相关的部分风险得以分散。（4）信息中介在搜集和解释财务信息方面会相互竞争。（5）管理当局为了取得投资者的资金也会相互竞争，他们有动机向投资群体提供财务信息。（6）投资者和中介人拥有可提供的信息，这些信息较之给投资者或 SEC 存档的年度报告更综合，而且可能更及时。（7）证券价格研究发现证券价格本身便是一个丰富的、综合的信息系统。（8）财务信息向投资群体的流动受一个由民间机构 FASB 和政府机构 SEC 共同组成的双重管制规范结构的制约。

投资者

投资者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构成极其复杂、而且互有差别的集团。例如，他们可能因为品位或偏好、财富、信念、对财务信息的获取以及解释财务信息的技巧等方面而有所不同。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他们对财务信息的需求。从一般意义上讲，对财务信息的需求将会是投资者财富、品位（如对待风险的态度）和关于未来信念的一个函数。由于这些属性因投资者的不同而异，所以他们对财务信息的需求也会因此而有所差别。另外，投资者在获取和解释财务信息的能力方面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专业信息用户（如财务和信息中介），相对于非专业信息用户（如个体或非机构投资者）来说，他们的信息需求也会有

^①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形下，投资者是指普通股持有者。该问题与前面所引用的 FASB 的说法是一致的。FASB 和 SEC 所指的主要用户导向是普遍股的投资者。这种导向是 1933 年和 1934 年证券法中所自然界定的。其他集团包括信贷人和雇员。在这里，对二者并不加以严格的区分。信贷人是投资者（资本的提供者）的一种形式。尽管他们的利益也许与股东的利益并不相同，但针对投资者所做的许多一般性陈述也可用于或可较容易地扩展到信贷人。所以，信贷人在这方面也不作为一个独立的构成来加以考虑。其原因在于节省篇幅，而不是说信贷人不重要。在美国，雇员在财务呈报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也相对较小。然而，在许多欧洲国家，雇员则扮演一种更为活跃的角色，并且，他们在美国也有可能如此表现。

所不同。

非专业投资者还可能在许多其他方面存在差异。如这些投资者可能不会在一个完全无助的模式下操作,而是拥有多种可选择的投资策略。这些可选择的策略表明了不同投资者需要不同财务信息的多元化信息需求的几个理由:(1)投资组合的直接管理与委托某一中介的投资功能转移;(2)信息中介的利用与非利用;(3)分散与不分散的投资组合政策;(4)积极与被动的投资组合管理。

如果个体转移部分投资程序给某一财务中介,那么,个体对财务信息的直接需求便会有所下降。^①在一定程度上,个体依赖某一信息中介的分析和推荐,也会降低对财务信息的直接需求。^②个体也许因为在获得和解释财务信息能力方面的局限,可能选择把此种功能转让给某一中介机构。个体就会使用某一中介机构的分析和推荐(换言之,该信息)来代替财务信息。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便构成对信息源的竞争。在这两种情形(转让给一个财务中介和转让给一个信息中介)中,个体投资者对财务信息的需求都会是间接的。

除了个体投资者可能转让给中介机构这一选择外,投资还可能在投资组合策略方面有所不同。这种投资选择的一个方面就是投资者可能选择风险分散。例如均值一方差组合理论(mean-variance portfolio theory, Sharpe, 1995)指出只有在投资者影响风险(回报方差)和与组合相联系的预期回报时,个别证券与投资者才会相关。在这种观点下,投资者的利益追求是整个组合的风险与预期回报。个别证券便成为可能建立的不同组合的平均值。从这个角度来看,证券回报当中的内部作用和相互关系便是利益,以及预期回报和个别证券回报的方差。事实上,对于好的分散风险组合而言,个别证券回报行为的某些方面可能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可能被完全分散掉了,如所谓的非系统风险。组合理论强调风险分散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可以降低与持有个别证券相关的大部分不确定性和风险。例如,个别证券对于回报而言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通过分散,这种风险(非系统的和可分散的风险)的大部分便可在投资组合层面上被消除。

因此,财务信息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投资者选择分散风险的一个函数。该投资者只有在有助于评价组合回报的属性时才会关心财务信息。对于好的风险分散投资者来说,诸如非系统风险等因素可能并不重要,而帮助

^①此处所使用的财务中介一词是指投资他人资金的所有机构,具体而言,它包括共同基金、封闭式投资公司、投资信托和退休金等等。

^②信息中介一词在这里是指财务信息搜集、处理、分析和解释的所有机构。它包括财务分析师、债券评级机构、股票评级机构、投资咨询服务公司和经纪人企业等等。

评价此类风险的财务信息也会毫无价值。但是，对于风险分散欠佳的投资者来说，此类信息则会显得至关重要。

同理，财务信息需求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投资者是采纳“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交易策略的影响。在消极的交易策略下，投资者只是购买和持有某种证券，在为了消费目的需要变现前很少考虑到交易。在这种情形下，投资者只是简单地去购买证券中一种好的风险分散组合(如一种“指数”基金)，这在根本上便否定了直接要求特定企业财务信息存在的必要性。与此相反，一位“积极”的炒家对信息则有着投机的需要。换言之，一项积极的政策涉及到对信息的持续需要，以使其能够发现定价失当的证券，并根据这类信息不断地买卖。从定义上看，积极组合的交易额较之消极政策交易额要更大一些。在许多案例中，积极的买卖政策试图利用短期的证券价格差获利，并希望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开放和关闭投机定位。这里，有助于预测证券价格短期波动的信息符合积极炒家的利益，但并不符合遵循消极政策并着眼于长期投资的投资者利益。

这些分类无疑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它们都难以独立成类。但是，这些分类却揭示了一个基本点。投资者的构成是极其复杂、互异的，他们对财务信息的需求也是极其复杂、互异的。他们可以在依赖财务和信息中介的环境下操作，也可以在采用投资组合策略的环境下操作，这些都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财务信息的直接需求。

信息中介

信息中介可以看成是一种产业，该产业的生产要素包括财务信息和其他类型的数据，其产品是分析和解释。信息中介的产出同样也是一种形式的信息。中介机构投入最初的信息，然后把它转换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信息。其中反映了他们理解、综合和解释原始数据的能力。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如果用户所依赖的信息是由某一中介提供的，那么，非专业用户对财务信息的直接需求就不会那么强烈。

更具体地说，信息中介履行了三种与信息相关的职能：(1)搜集非公开提供的信息(下称私有信息搜集)；(2)围绕预测分析、处理和解释信息(下称预期分析)；(3)事后事项解释(下称反馈分析)。

因此，财务呈报和信息中介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在一个层面上，公开财务呈报为此类中介提供了一个投入因素源。然而，如果中介的部分职能是获取更综合和更及时的信息，那么，财务呈报就可能只是信息中介所提供信息的一个竞争性信息源。而且，信息中介还会在搜集和解释财务信息方面形成相

互之间的竞争。

信息中介从事私有信息搜集。民间信息系统是巨大且活跃的。^① 分析师之间对于披露和对披露的解释方面的竞争可能导致证券价格反映出一个更宽广的信息系统。证券法规生效时所鼓励的法规性陈述也显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专业投资机构内部对 SEC 档案解释的相互竞争,才能形成某种“有效的”证券价格。^②第 6 章将进一步讨论证券价格与财务信息之间的关系。

财务呈报环境中的信息和信息中介的作用正日益引起财务呈报规范者的认同。作为财务呈报系统主要目标的专业用户的认同可以下述方式来加以反映:

1. 信息中介,如分析师,可以看成是投资者需要额外财务呈报需要的主要代表。因此,FASB 和 SEC 把这一阶层看成是揭示更多信息的思想源泉。如果财务呈报政策的制定者指向信息中介,那么,他们的偏好将会成为未来财务呈报要求的一个重要晴雨表。分析师在分部或分化呈报以及管理当局预测中的利益便是最明显的例子。^③

2. 财务呈报要求假定用户具有某种更为复杂和技术性的技巧去解释所报告的数据,而不是像以前所假定的那样。FASB 关于外币折算、退休金、其他退休后福利和股票期权津贴方面的准则,便是财务呈报要求有更多对专家解释考虑的最明显的例子。

3. 将会更强调呈报中所谓的“软数据”,如未来导向的揭示和现行成本数据。

4. 将会更强调披露而不是单一的盈利数字。揭示被用于报告特定事项的财务方面,而不是这些呈报是如何与得出该企业的“该”净收益或盈利——对应的。这种远离单一“最佳”盈利计量的转移,使投资者有更多机会以某种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去进行财务披露分析。

财务呈报的规范者

财务呈报环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财务信息向投资者流动的规范。尽管国会和独立的规范机构也可能影响财务呈报要求,但主要的规范者还是 FASB 和 SEC。

SEC 和 FASB 就财务呈报对投资者的影响有一个共识 (FASB 1976b, Chap-

^①作为信息中介的分析师的作用在希珀的文章(Schipper, 1991)中有所讨论。

^②考虑法官威廉·O. 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 1933)的下列陈述,耶鲁大学的一位教师曾经指出:“即使某位投资者没有时间、金钱或者智慧去消化在注册报表中的大量信息,但这并不排除有人能够而且将会这样去做,无论是不是有一个更大的市场。那些专家的判断将会反映在这个市场的价格中。”

^③财务分析师阶层对增加财务呈报已经提出了好几份建议(参见:AIMR, 1993)。

ter 2; and SEC 1977, Introduction)。投资者导向是 1933 年和 1934 年证券法所自然界定的内容。这一导向部分地表现为对投资者福利的考虑。市场的“公允性”表明他们买卖证券的公正性,和规避已察觉的风险,以及可能使投资者由于信息的低效率(如未能揭示重大的财务信息等)而处于危险境地的不公正。然而,政策制定者也表现出对财务呈报对资源配置和资本构成的影响的关心。

规范制度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的双重管制结构。尽管 FASB 和 SEC 对有关财务呈报目的的理解是类似的,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没有清楚地界定过。SEC 公司披露咨询委员会(SEC, 1977)所建议的公司披露目的,类似于前面引用过的 FASB 的目的公告。该咨询委员会在 SEC 公司披露目标中指出:

为了确保以一种有效率和合理的方式使可靠的、企业导向的信息能在及时性的基础上具有公开的可提供性。这些信息对有依据的投资和公司通常的决策制定是重大的。(p. D-8)

目标的相似性进一步使得财务呈报的两个方面——披露与财务会计之间这种本已模糊的区别变得更加模糊不清。这种区别曾经一直是界定 FASB 和 SEC 之间管辖权的主要标准。从原理上看, FASB 的管辖权可以看成是制定财务会计准则,而 SEC 的管辖权则在于披露。但这种区别却从来就没有很好界定过。作为一个实务问题,这种区别又是难以操作的。FASB 的准则通常也包括披露要求。事实上,部分准则,如分部呈报准则则被许多人认为主要是披露准则。与此类似,SEC 影响了财务会计准则,这一点已被霍恩格伦(Hornigren, 1972, 1973)和阿姆斯特朗(Armstrong, 1977)很好地证明过。第 7 章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并为审视 FASB—SEC 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框架。

管理当局

管理当局,与其他的管理当局共同竞争投资者的资金,具有提供财务信息给投资阶层的动机(Healy and Palepu, 1993)。而且,管理当局可以被看成是投资者委托控制其资源的代理人。这种受托责任观意味着管理当局有责任按照投资人的利益行事。管理当局扮演着包括生产代理人、风险承担人和信息供应者的多种角色。财务呈报是管理当局的主要职责所在。这些财务呈报有助于评价管理当局的受托责任。这种财务呈报责任在 1933 年和 1934 年证券法下以管理当局法定义务的方式得以强化。财务呈报的法定义务和法定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在弗兰西斯、菲尔布里克和希珀(Francis, Philbrick and Schipper, 1994)的论文中已有讨论。在众多因素中,管理当局的财务呈报最可能影响管理当局可能获取追加筹资的条款和可能影响该企业的竞争性立场。所以,管理当局在财务呈报环境中具有明显的立场,并作为财务报表的编制者和财务

信息的供应者发挥某种重要的作用。

审计师

管理当局在财务呈报方面的动机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他们的报告将受到审计师的‘监督’或鉴证。独立于管理当局的‘审计师’的概念是审计师职业道德和强调审计师对财务报表用户的责任的一个部分。与管理当局的责任一样，这种责任也通过证券法中审计师的法定义务方式予以强化。审计师，除了同样是风险的承担者之外，还是信息的主要供应者，并在财务呈报环境中拥有明显的立场。

关于环境的总结

财务呈报环境主要包括上述所讨论的五个方面，尽管其他集团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牵涉其中。这些利益关系人中，每一类利益关系人的作用和利益都是有所不同的。而且，同一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是不同质的。这些利益关系人及可能的子集团可以概述为表 1—1。鉴于这一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财务呈报可能演绎出各种各样的经济后果，而且，各种利益关系人并非都会以相似的方式受到这些后果的影响。

表 1-1

财务呈报环境的构成

I. 投资者

- A. 分散与不分散风险
- B. 积极与消极
- C. 专业与非专业

II. 信息中介

- A. 财务分析师
- B. 债券评级机构
- C. 股票评级机构
- D. 投资咨询服务
- E. 经纪人企业

III. 规范者

- A. FASB
- B. SEC
- C. 国会

在各种后果和各种利益关系人之间进行平衡。而且，它还涉及到在利益关系人内部进行平衡。例如，好的风险分散投资者对财务呈报制度的偏好，也许就会与欠风险分散的投资者的偏好不同。同理，消极型组合策略的投资者便会与积极型组合策略的投资者对财务呈报制度的偏好有所不同。在投资者所隐含的理由方面，这种多元化也许便会演绎出财务呈报制度多种复杂且相异的偏好来。

关于‘最佳’财务会计准则的争论不仅强调传统的‘技术’问题，如哪种方法才能产生成本与收入的“最佳”配比，而且也会侧重于经济后果。

考虑到经济后果与利益关系人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性，财务呈报政策的制定者应当对此加以考虑（Armstrong, 1977; Rappaport, 1977; and Zeff, 1978）。为了讨论这类问题，需要有一个框架来确认多重个体背景下的信息作用（第 2 章）和作为解决社会选择问题机制性方法的规范的理性（第 7 章）。

1.6

财务呈报中的现行趋势和关键性特征

本章把财务呈报中的趋势概括为表 1—3 中的几个方面。本章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了这些趋势，并描述了这些趋势即将发生的财务呈报环境。该环境的一个关键性特征是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一特征可能影响主要利益关系

表 1—3 财务呈报中的现行趋势

I. 总体
A. 财务会计从经济收益观向信息观转移
B. 日益强调财务呈报环境和财务信息专业用户的复杂性
C. 认识到选择财务呈报制度的社会选择性质
II. 具体
A. 呈报要求的快速增长
B. 盈利重视程度的减弱与披露重视程度的增强
C. 强调更具专家化解释的披露要求
D. 强调‘软’数据
E. 对经济后果的争论

人（投资人、信息中介、规范者、管理当局和审计师）之间和之内的财务信息偏好。各种不同后果可能导源于一项财务呈报政策，而且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利益关系人。所以，这就有可能会缺乏对“最佳”呈报制度的共识。财务呈报制度之间的选择可以在本质上看成是涉及利益关系人之间平衡的一个社会选择问题。在这种观点下，准则制定便成为政治程序的结果。

表 1—4 列示了财务报表的十个关键性特征。这些特征描述了现行编制的财务报表的主要特点, 这些特征将在后续章节作进一步讨论。

表 1—4 财务呈报的关键性特征

1. 许多项目的细分、季度呈报与其他项目的年度呈报
2. 应计会计
3. 一般目的财务报表既包括资产负债表，也包括损益表
4. 应计项目和其他地方的分离与判断
5. 作为财务报表组成部分的脚注
6. 大部分交易的净剩余关系
7. 稳健主义
8. 已审财务报表、对公众持有企业的管制
9. 一种双重管制结构, 包括 SEC 和 FASB

1.7

后续章节概要

第2章将在单一个体与多重个体背景下更详细和更深入地探讨信息的性质。该章将讨论信息观运用中所存在的、潜在的戏剧性影响，并审视财务呈报的潜在经济后果。

虽然 FASB 已经采纳了一种信息观，但它所认同的财务呈报仍然主要侧重于盈利及其构成的信息方面。因此，第 3 章和第 4 章将详细探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盈利概念。该章将讨论盈利与证券定价的关系，并指出为什么盈利信息对投资者的证券分析具有潜在价值。同时，该章还将审视经济收益观下的盈利性质是如何与信息观形成对照关系的。第 5 章将就盈利与证券价格之间的关系来评述经验性的证据。该证据表明证券价格是否可以表明盈利是重要的，而且是惟一的信息源。

证券价格在财务呈报环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证券价格研究已经成为财务呈报研究的主要领域。第 6 章将详细探讨价格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财务呈报环境中各种利益关系人的影响。

财务呈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财务信息向投资阶层的流动，且这种流动被一种双重管制体系所规范。第 7 章将探讨财务信息规范的潜在经济理性，同时还讨论该双重管制体系下的财务呈报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

(薛云奎译)

参考文献

- AICPA. "Improving Business Reporting — A Customer Focus."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Financial Reporting. New York: AICPA, 1994.
- AIMR. "Financial Reporting in the 1990s and Beyond." Position paper prepared by P. Knutson. Charlottesville, VA: AIMR, 1993.
- Alexander, S. Five Monographs on Business Income. New York: Study Group on Business Income, AI(CP)A, 1950.
-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Committee on Concepts and Standards for External Financial Reports. Statement on Accounting Theory and Theory Acceptance. Sarasota, Fla: AAA, 1977.
- . "The Politics of Establishing Accounting Standards." *Journal of Accountancy* (February 1977), 76 – 79.
- Canning, J. *The Economics of Accountancy*.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29.
- Chambers, R. *Accounting, Evaluation and Economic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6.
- Douglas, W. "Protecting the Investor." *Yale Review* (1933), 523 – 524.
- Edwards, E., and P. Bell.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Business Inco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Scope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Project*. Stamford, Conn.: FASB, December 2, 1976b.
- .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Concepts No. 1* Stamford, Conn.: FASB, November 1978.
- Francis, J., D. Philbrick, and K. Schipper. "Shareholder Litigation and Corporate

- Disclosur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autumn 1994), 137 – 164.
- Healy, P., and K. Palepu. “The Effects of Firms’ Financial Disclosure Strategies on Stock Prices.” *Accounting Horizons* (March 1993), 1 – 11.
- Hornigren, C. “Accounting Principles: Private or Public Sector.” *Journal of Accountancy* (May 1972), 37 – 41.
- . “The Marketing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Journal of Accountancy* (October 1973), 61 – 66.
- Ijiri, Y. “Cash Flow Accounting and Its Struct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Finance* (summer 1978), 331 – 348.
- Paton, W. *Accounting Theory*. Chicago: Accounting Studies Press, Ltd., 196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2).
- and A. Littleton. *An Introduction to Corporate Accounting Standards*, Columbus Ohio: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1940.
- Rappaport, A. “Economic Impact of Accounting Standards—Implications for the FASB.” *Journal of Accountancy* (May 1977), 89 – 98.
- Schipper, K. “Analysts’ Forecasts.” *Accounting Horizons* (December 1991), 105 – 121.
-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Report of the SEC Advisory Committee on Corporate Disclosure*.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November 1977.
- Sharpe, W. *Investments*,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95.
- Skousen, K. F.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EC*, 3d ed. Cincinnati, Ohio: South-Western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 Sterling, R. *Theory of the Measurement of Enterprise Income*.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70.
- Zeff, S. “The Rise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 *Journal Accountancy* (December 1978), 56 – 63.